DOI:10.16095/j.cnki.cn32-1833/c.1983.04.021

武王伐纣年代考

周文康

武王伐纣的确切年代，历来聚讼纷纭。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了武王伐纣时的《利簋》，又引起了当今学术界重新探讨这一千古之谜的兴趣，已有若干文章先后发表。笔者读后，似觉均欠允当，故不揣浅陋，提出来就教于方家。

《淮南子》的记载不可全信

《淮南子·兵略训》载："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1978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先生根据哈雷彗星的运行规律，由公元1910年4月19日哈雷彗星出现（目测），逆推出公元前1057年3月7日为此前第四十次哈雷彗星回归过近日点的日期，谓是年头三个月内在地球上均能看到它，"其柄"正向东（殷方），与上引《淮南子》所记吻合（见《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天文学报》第十九卷第一期）。又，《国语·周语下》载伶州鸠云："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据张钰哲、张培瑜两位先生推算，公元前1057年3月7日木星（即岁星）黄经经度为127.2°（即张宿10.2°），正当鹑火之次，似亦合于《周语》所记。赵光贤先生对公元前1057年初"木星和哈雷彗星同时出现在东方天空"深信不疑，并"就金文和文献的材料作一些补充证明"。然所有补证无一涉及哈雷彗星。补证之一即《利簋》铭文（余下详），释曰："铭文中的'岁'字，应一字读断，意思是岁星见于天空。"又云："武王伐纣时，自孟津渡河东行，早晨一定见到岁星在东方，正当殷人头上，……"（见《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重点号系引者所加，下同。）

早晨岁星在东方出现，即后世岁星纪年法所谓"与日晨出东方"。如公元前1057年3月岁星果真与日晨出东方，其时岁星当在玄枵之次①；若是年3月7日岁星确在张宿10.2°，待其伏（合日）后再现——与日晨出东方时，岁星已在鹑尾之次翼宿9.5°许，日在同次轸宿5.5°左右，时值周正九月（夏正七月），哈雷彗星早已过近日点而看不见了。即使撇开张先生的哈雷彗星轨道演变的结论，按现在哈雷彗星回归周期为七十六年推算，再根据哈雷彗星最早的文献记载《春秋经·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逆推，这次哈雷彗星出现的年代为公元前1069年，与公元前1057年刚好差十二年，岁星依然是在鹑尾之次与日晨出东方。所以，根据张先生从哈雷彗星的运行规律及岁星位置两方面来验证文献有关记载可靠性的科学方法，是可以引出如下正确结论的：《淮南子》是项材料自相牴牾，故至少不可全信。至于千虑一失，圣人亦在所难免。

《国语》的记载也不可信

赵光贤先生释《利簋》铭文，以"岁"一字断句，谓义为"岁星见于天空"，古籍中似无此类例证。即使按赵先生断句、释义，也只能说明武王伐纣时"早晨一定见到岁星在东方"，而无以证明"岁在鹑火"。诚如上述，据张钰哲、张培瑜两位先生推算结果（公元前1057年3月7日木星的黄经经度为127.2°），可知是年岁星于周正九月在鹑尾之次与日晨出东方。大家知道，《国语》、《左传》所记"岁在××"之类，都是说这一年岁星在该次与日晨出东方的意思。所以，倘《国语》"武王伐殷，岁在鹑火"的记载可靠，当在公元前1058年；若公元前1057年确为武王伐纣之年，当为"岁在鹑尾"。

荣孟源先生《试谈西周纪年》一文（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1期），引《利簋》铭文断句为："武王征商，隹甲子朝，岁鼎克闻，夙又商。……"未视"岁"为岁星。但其后亦引《周语》"武王伐纣（殷），岁在鹑火"，并

云："章鸿钊'从岁在鹑火推寻春秋所传伐殷之年'，用两个公式推算。依第二式，'以公元前1055年至公元前1054年，或公元前1043年至公元前1042年为最近。'依第一式，'以公元前1057年至公元前1056年及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1045年为最近。……'"继之又转引了章氏《中国古历析疑·武王克殷年考》中"从《武成篇》之生霸死霸推校克殷之年"、"王公积年处理法"两节的主要内容及其结论——"则武王克殷之年，正当公元前1055年"。查章书原文，荣先生引文有误，且删去了重要字句，为此补全后抄录如下：

> 如战国时以公元前一〇五〇年为始伐殷之年（按：章先生推算所得的岁在星纪、太岁在寅之年——引者），则检前岁在鹑火表，以公元前一〇五五年至一〇五四年，或一〇四三年至一〇四二年为最近；若是年岁星实在鹑火，依（Ⅰ）式即以前一〇五八至一〇五七年（按：非前一〇五七至一〇五六年——引者）及一〇四六至一〇四五年为最近。（科学出版社，1958年6月第1版，一〇五页。以下只注页码）

此前章文有云：

> 从（Ⅰ）式所得，为岁星实在鹑火之始（"始"疑为"时"之误——引者），如公元前一〇五七·五五年至一〇五六·五五年，一〇四五·六九年至一〇四四·六九年，皆为岁在鹑火之年。从（Ⅱ）式为按古率推得岁在鹑火之年，次表所示者即是：……（一〇〇页）

从（Ⅰ）式所得数据与两位张先生推算结果相差甚微。因岁星在鹑火与日晨出东方在周正八月，故"岁在鹑火"当为"公元前一〇五八、一〇四六……年"，而不是"公元前一〇五七、一〇四五……年"。又，诚如章先生所云，公元前1055年实际上并非"岁在鹑火"（在大火）。而要认定公元前1055年"岁在鹑火"，是由西周初或后人采用章先生作为（Ⅱ）式推算依据的古率，并以"公元前一三二六年秋九月顷岁星正在星纪之始"为基点推算所得；至少说查无实据。所以，如果武王伐纣确在公元前1057年或1055年，"岁在鹑火"就当否定；反之，如果武王伐纣之年确实"岁在鹑火"，那就不在公元前1057或1055年，不能两全。

赵光贤先生又用鲁公积年推算武王伐纣之年。考公至共和元年历代鲁君在位年数，《史记·鲁世家》均有明文记载。周公摄政七年，亦无疑。武王克殷后在位年数和伯禽在位年数，则文献记载不一。据章鸿钊先生《中国古历析疑·武王克殷年考》所引，前者有七年（《管子·小问》、《汉书·律历志·世经》）、六年（《逸周书·明堂》、《帝王世纪》）、三年（《淮南子·要略训》、《史记·周本纪》）诸说。后者更多一层分歧，即：即位年代有两说，一为成王元年（《周本纪》、《鲁世家》），一为成王八年（《世经》、《竹书纪年》）；去世年代亦有两说，一为康王十六年（《世经》、《帝王世纪》），一为康王十九年（《竹书纪年》）；然《竹书纪年》又云康王二十一年"鲁筑茅阙门"，据《鲁世家》载："鲁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为炀公。炀公筑茅阙门。"则伯禽没世当在康王十六年或更早。如果各取所需地援引上述不同材料推算武王伐纣之年，可以得出十二种不同的结论，所以毋庸赘述，武王克殷后在位年数和伯禽在位年数，无论取那一说然后推得的武王伐殷之年，都至多只能作为其它材料的辅证；如作为立论的主要依据，恐怕是很靠不住的。赵光贤先生和章鸿钊先生根据这些材料，得出不同的结论——一为公元前1057年，一为公元前1055年，就很能说明问题。但他们都把公元前1058、1046年这些真正的"岁在鹑火"之年断然排除在外——因为和文献所载任何一说不合，倒证明了《国语·周语下》载伶州鸠所云"武王伐殷，岁在鹑火"之不可信。

对《竹书纪年》记载错讹的两种推测三位先生都算错了一年

赵光贤、荣孟源两位先生都引《史记集解·周本纪》引《竹书纪年》曰"自武王克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又都认为"二百五十七年"系"二百七十五年"之误。赵文以公元前771年（幽王十一年）为基点，减去十一年（幽王在位年数），再减去二百七十五年，得公元前1057年（$-771-11-275=-1057$）。其实，以幽王十一年求幽王元年，只须减去十年，即：$-771-(11-1)=-781$，公元前781年为幽王元年；以此再减去二百七十五年，应为公元前1056年。荣文则以公元前781年（幽王元年）为基点，减去二

百七十四年，得公元前1055年。以此推算，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至一九八二年，岂不当“凡三十四年”！也许两位先生都是先有了结论再逆推的，然按两位先生各自的结论逆推，“二百五十七年”当分别为“二百七十六年”“二百七十四年”之误，这样校改《竹书》似依据不足吧。

何幼琦先生则认为：“‘自武王灭殷以至于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这分明是整理者统计后的概括之辞，并非《竹书纪年》的正文，可能是束哲整理《纪年》时，在统计方法上，遵照后世的先王缺位，当年改元的习惯，将文、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厉、共和、宣等十二世的末年，并入后一世的元年了。”“西周积年，从武王克商（公元前1039年）到幽王灭亡（公元前771年），共计二百六十九年。”（见《周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何先生推断“二百五十七年”当为“二百六十九年”之误是有道理的，何先生本人两处推算之误即可佐证。其一，如前述，公元前771年上推二百六十九年，应为公元前1040年（—771－269=—1040）。其二，何文引《周本纪》：“既克殷后二年……武王病……有瘳而后崩。……周公乃行政当国，……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还政成王。”再以何文推得的成王元年（公元前1030年）上推武王伐纣之年。据此，武王伐纣亦当在公元前1040年，崩于公元前1038年（后二年）；周公摄政在公元前1037年至公元前1031年（七年）。而何先生这两处推算都错了一年，所以结论为武王伐纣于公元前1039年。

综上所述，根据三位先生各自的论据，结论都错了一年。

周成王元年为公元前1030年的补证

考定武王伐纣之年，先从相近的周王纪年着手，不失为一正确途径。如果周成王元年的确切年代能够考定，那么武王的卒年也可确定（中间相隔周公摄政七年），伐纣之年亦可圈定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据何幼琦先生考证，成王元年为公元前1030年。何文先据《庚嬴鼎》、《小盂鼎》两器铭文，结合历法推算，认定“两器相应的元年中，共同的年份是公元前1013年，这就是康王元年。”②其后，引《周本纪》：“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谓康王在位年数“单单从《小盂鼎》的二十五年来说，已经超过了两世的平均年数”，“则成王元年不外是在公元前1033年至1029年”。又根据《尚书·洛诰》及《召诰》所记，云：“在成王元年的上年，有两个独特的日辰做为标志，一是二月既望庚寅，一是三月丙午朏。”“三月丙午朏可以换算为正月承大丙午朔或承小乙巳朔，二月既望庚寅，可以换算为正月丁酉至乙巳朔，上述五年（指公元前1033至1029年——引者）中，只有公元前1031年符合这个条件（指正月乙巳朔——引者），这就证明了成王元年是公元前1030年。”

《尚书·洛诰》及《召诰》，历来认为是可信的。但也许有人认为，何文仅引《周本纪》“成康之际……”一语即下结论：“则成王元年不外是在公元前1033年至1029年。”似不足以令人信服。我们不妨再先来看看公元前1099年至公元前1013年（康王元年）间，有哪几年“二月既望庚寅”而又“三月丙午朏”——正月乙巳朔。考虑到历术推步有时不免有一日之差，我们适当放宽了标准。查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自周初至春秋之月朔干支表》（中华学艺社1933年7月版沈璿中译本），正月丙午朔有二：公元前1052及1021年；正月乙巳朔亦有二：公元前1088及1057年。何幼琦先生推算所得的朔日与之均有一日之差，何之乙巳朔即新城氏之甲辰朔，何之丙午朔即新城氏之乙巳朔。据此，正月丙午朔有二：公元前1088及1057年；正月乙巳朔有一：公元前1031年。这五年中，公元前1021年离康王元年太近，可排除；公元前1088又相距太远，达七十余年，亦不可能。如成王元年的前一年为公元前1057或1052年，成王亲政亦有四十三年和三十八年；加上周公摄政七年，其实际在位则达整整半个世纪或四十五年之久。据《周本纪》载：“成王将崩，懼太子钊（即康王——引者）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可见其时康王年岁并不大，故成王亲政不可能有四十年左右。又，成王元年若为公元前1056年，至幽王元年（公元前781年）即已有二百七十五年，与前引《竹书》“自武王克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不合。公元前1051年为成王元年，亦有此矛盾。唯公元前1030年为成王元年，则成王亲政不到二十年，合于上引《周本纪》所

记。如前所述，以此上推武王伐纣于公元前1104年，至幽王末年（公元前771年）恰为二百六十九年，正合何先生推断“二百五十七年”系束晳统计之误而少了十二年的结论。因此，如不能推翻《洛诰》、《召诰》的记载，又不能证明成王元年为公元前1056或1051年，就不能否定公元前1030年是成王元年，公元前1038年是武王卒年。这两点一经肯定，武王伐纣于公元前1057、1055年等种种说法，亦断难成立——因为离武王之死实在相距太远了。

由文献记载结合历法推算武王伐纣之年

有关武王伐纣之年、月、日，见于文献的还有：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牧野，乃誓。（《周本纪》）

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齐世家》）

惟一月丙辰旁死魄，若翌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越若来，二日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逸周书·世俘》）

惟一月壬辰死霸（同魄—引者），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

粤（同越—引者）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

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以上见《汉书·律历志·世经》引古文《尚书·武成》）

据何幼琦先生校勘：《周本纪》“‘二月甲子’应作‘十二年正月甲子’”；《齐世家》“‘十一年’当系‘十二年’传抄的讹误”；《世俘》“‘二月既死魄’当系‘十二月既死魄’夺失了‘十’字。”又云：“《世俘篇》大致是战国时人根据残缺的资料补纂写成的，真实的部份大概是：‘……丙辰……丁巳……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咸刘商王纣。’”“这篇文章，后来给刘歆剽窃了去，修改一下，冒充失传了的古文《武成》，反而当成引文塞进《世经》中，……”将《武成》和未经何先生校勘之《世俘》原文互校，可知何文所云刘歆“修改一下”，乃“惟一月丙辰旁死魄，若翌日丁巳”“改”成了“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又，据何先生考证：“牧野战役是在文王十一年（公元前1040年）十二月进军，会战发生在十二年（公元前1039年）正月甲子昧。”“据推算，十一年正月戊辰朔”，即公元前1040年周正正月戊辰朔，是月正二十五日（旁死霸）壬辰，二十六日癸巳；月内既无丙辰，更无丁巳——若何文不推算错一年，岂不正好说明《世俘》误、《武成》不错吗？何先生坚持“会战发生在十二年（公元前1039）正月甲子昧”之说，是为了引出以下结论：正月昧“按商、周的历法说，就是新年之首日，后世名为元旦，不难看出，武王的进军，是利用节日，出敌不意，远道奔袭，冒险成功的一次战例。”此纯属臆测。在没有足够的依据证明《世俘》“二月既死魄”前确实脱一“十”字的今天，此说更不能成立。

前面我们已纠正何文两处推算之误，得出武王伐纣当在公元前1040年，现不妨也验之历：（以下月朔干支系查新城氏《自周初至春秋之月朔干支表》所得，括号内为何先生推算结果。）

公元前1041年十二月，丁酉朔，廿二日戊午——《周本纪》：“十二月戊午”；

公元前1040年，正月丁卯（戊辰）朔，廿六（廿五）日壬辰，廿七（廿六）日癸巳——《武成》：“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二月丙申（丁酉）朔，廿九（廿八）日甲子——《世俘》、《武成》：“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四月乙未朔，十六日庚戌，十七日辛亥，廿一日乙卯——《武成》：“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翌日辛亥，……粤五日乙卯”。

对照王国维《生霸死霸考》云：“古分一月之日为四分，一曰‘初吉’，谓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自八、九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谓十五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也；四曰‘既死霸’，谓自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也。若更要欲明其日，于是有‘哉生霸、旁生霸、旁死霸’诸名。哉生霸为二日或三日；旁者，溥也，义进取于既，如既生霸为八日，则旁生霸为十日；既死霸为二十三日，则旁死霸为二十五日。”可说无不相合！这里需加说明的有二：其一，《周本纪》“二月甲子昧爽”句中“二月”下，《集解》引徐广曰：“一作‘正’。

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其意甚明。故《齐世家》作“正月甲子”，《集解》不再加注。何文引徐广曰：“一作‘正’”三字校改《周本纪》“二月甲子”为周正“正月甲子”，不妥；其二，《世俘》上下文自相牴牾，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则一月必定不是“丙辰旁死魄，若翌日丁巳”，故取《武成》“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

武王伐纣可能在公元前1040年，还可由岁星位置佐证。由公元前1057年3月7日木星的黄经经度为127.2°（张宿10.2°），可推出公元前1040年周正二月廿九日木星的黄经经度为280.5°（婺女2.5°）左右。是月初，木星始“与日晨出东方”，廿九日早晨尚可在东方看到木星。这和前引《淮南子》记“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相合。（《淮南子》所记不可信的是“彗星出”）《荀子·儒效》：“武王之伐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高诱注：“太岁在寅。”寅在东北隅；迎者，逆也，谓冲犯太岁，亦通。杨倞注引《尸子》：武王伐纣，鱼辛谏曰：‘岁在北方，不北征。’”婺女二度半在星纪末，星纪正值北方玄武之位，牧野在周东偏北，殷都（今河南安阳）又在牧野北偏东。“东面而迎岁”、“东面而迎太岁”、“岁在北方，不北征”，都说得通。赵光贤先生认为《尸子》“此二‘北’字，当是‘东’字之误”，似依据不足。又《竹书》亦记武王伐纣在寅年（即太岁在寅，岁星在星纪之年），“庚寅”两字虽为后人所加，但当有所本推算所得。章鸿钊先生认为“战国时所传伐殷之年，殆无不以为太岁在寅，而岁在星纪矣。”（一〇四页）此说甚是，《利簋》的出土更证实了所传不妄。

《利簋》铭文透露的信息

许多专家、学者都注意到《利簋》铭文“惟甲子朝”句，证实了文献记载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的可靠性；赵光贤先生则猜测到了铭文“岁”字与岁星有关（尽管断句、释义均欠允当）；汤炳正先生更揭示了铭文的真谛，其断句为：“武王伐纣，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又（有）商。……”释曰：“‘岁’，指岁星”，“‘鼎’即贞字”，“用《尚书·洛诰》马融注‘贞，当也’这一古训”，“《汉书·匡衡传》服虔注云：‘鼎，犹言当也’，这跟马融训贞为当，是一个道理。”“‘克’与‘辜’同字”，“形近、义通、音读相同”，“为月名，即《尔雅·释天》‘十一月为辜’的辜字。”“夏正的‘十一月为辜’，即周历的正月。”“‘岁贞克’，即指当时岁星正当周正的正月晨出东方。”“下文的‘昏’读‘昏’，不读‘闻’，应以‘昏夙有商’为句，‘昏夙’即‘昧爽’（按：指《周本纪》“二月甲子昧爽”的昧爽——引者）。”（见《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讨》——《四川师院学报》1978年第4期）对汤先生的释义，我们只有一点异议，即铭文“克（辜）”与《尔雅》“十一月为辜”之辜虽有关系，但两者不能划等号。依愚之见，武王伐纣时可能尚无此十二月名。历来对此十二月名的来历都不甚了了。前人曾作过不同的猜测，一说：“孟春之月（即夏正正月——引者），日在营室，营室即亥方陬訾之次。《尔雅》之释正月为陬，义疑取此。”（见朱冀《离骚辨》）新城新藏亦云：“陬，系指陬訾之陬，乃指太阳在娵訾（营室）时之孟春月。”（见《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五七三页）这比朱熹引《说文》“陬，阪隅也”释义合理。③我们的看法稍有不同，很可能这十二月名最初即星纪等十二次的别名，或别名之简称。因夏正正月日在陬，故该月后来名之曰“陬”；同此，夏正十一月日在辜，故后来名该月为“辜”。后来，这一组十二次名就作为十二月名流传下来，而星占家、天文历法家们都用另一组十二次名了。仅“陬”和“陬訾”因在两组不同的十二次名中为同一次名，又有一字相同，才给后人透露了一点信息。但十二次名仍另有异名，如“陬訾”又名“豕韦”（见《左传·昭公十一年》），“玄枵”又名“颛顼之虚”（见《左传·昭公十年》）。可见曾另有一或二组十二次名当非纯属臆测。因此，《利簋》铭文“岁鼎（贞）克（辜）”，实意为岁星正在“辜”——星纪。又因当时岁星在婺女二度半许，即星纪末；“与日晨出东方”时，日已在岁星前半次左右（后世或定为前半次，或定为前十三度，周初尚没有这么精确，姑作前半次），即已在玄枵，所以是周正二月，而不是周正正月。这样，铭文和前引文献所记完全一致，武王伐纣时的岁星也有了着落。

综上所述，武王伐纣于公元前1040年的推

连云港将军崖岩画题材刍议

盖山林

1979年在连云港市西南九公里将军崖发现的一处岩画遗迹，以它特有的学术价值，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几年来已有多篇文章①，对这处岩画的年代、题材、性质、地史背景和学术价值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然而，时至今日，尚没有取得一致意见。1982月6月，笔者在连云港博物馆同志的热情支持下，曾到现场参观学习，本文拟将参观所得，对这处岩画的题材问题，略陈鄙见，以求教于各位专家。

一

考察将军崖岩画的题材、风格，与同类题材的比较，与国内外岩画的比较，岩画的风蚀程度、制作的方法，将军崖附近的古遗址情况，可以知道这里的大部分岩画属于原始社会的遗存。但是也可以看出，有个别画面与古老的画面回然有别，其中有的如图a、图b、手枪、棋盘等，这些岩画是用金属工具凿刻的，而不是象其它作品那样是磨刻的，刻痕也新鲜得多，显然都是近现代人所为。在探索将军崖岩画题材时，应首先将其剔除。

其余的画面，从磨痕看，也有浅宽和深窄之别，说明不是一次作画，而是多次磨刻的。但从磨痕色调、制作方法和题材内容看，基本上是一致的，作画时间虽有早晚，但总的来说，都应视作原始社会的作品。

岩画虽分布成三片，但从内容看，整个将军崖岩画是统一的整体，其间并没有时代和意义上的差别，因此，不必分片探索岩画题材。

二

将军崖岩画的题材多种多样，但几乎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原始社会的天道观念。

第一种题材是天体岩画，其中太阳岩画是对太阳的模写，作图c、图d、图e形，同样或类似的太阳形，也见于其他各地的岩画中。如阴山乌拉特后旗达里盖沟那仁乌拉地方，在沟边一巨石上，就有一类似太阳形

断。和有关文献及金文所记，绝大多数是吻合的（再要找出第二个这样的年份，似无可能）；明显不合的仅《周语》“岁在鹑火”及《淮南子》“彗星出”两条记载。我们认为，这两项材料当予否定。

1983年3月三稿于广陵便益门

注：

①周正正月（夏正十一月）日在斗（星纪），周正二月（夏正十二月）日在婺女（玄枵），周正三月（夏正正月）日在营室（诹），见《吕览》、《礼·月令》。公历3月相当于周正二月。

②荣文论据、结论与此同。

③《楚辞集注》云：“陬，隅也。正月为陬，盖是月孟春，昏（昏）时斗柄指寅，在东北隅，故以为名也。”朱冀《离骚辨》已辨之曰：“盖一岁惟四仲月，斗柄指东南西北；其余八个月，无不偏指一隅也。若谓正月孟春当称孟陬，则夏秋冬不皆有孟月乎？”朱熹说不足信。